

论五四时期北京《晨报》的媒介批评实践及话语特色

胡正强 李思琪

【摘要】重视开展媒介批评是五四时期北京《晨报》一个十分突出的新闻理论建构形式与话语实践。该报曾对当时中国新闻界普遍存在的社会新闻低俗、国际新闻缺乏、新闻报道失实、事实与议论混杂的新闻写作方式等问题进行尖锐的抨击；对社会势力收买新闻媒体、记者借新闻报道谋取私利、记者缺乏科学常识却又不愿装懂诸多不良现象，从表现和成因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揭露和分析，以期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媒体的反省。自觉的主体意识、强烈的现实关怀、浓郁的批判色彩、开阔的世界视野、平等的对话空间、多样的批评形式，是五四时期北京《晨报》媒介批评实践的主要话语特色。五四时期《晨报》的媒介批评具有整体性的意义，是当时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彰显自身本质存在与发展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论话语反映。

【关键词】五四时期；北京《晨报》；媒介批评

【作者简介】胡正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思琪，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南京 21002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报刊阅读史研究”（23BXW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在媒介批评发展史上，有研究者认为五四时期是“中国媒介批评的诞生期”^[1]。这是因为五四时期的媒介批评，不仅具有了某种新的媒介主体自觉意识，创造出了数量可观的媒介批评文本，留下了宝贵的媒介批评遗产，而且获得了远比从前重要的社会地位。在五四时期媒介批评的场域中，以北京《晨报》的表现最为突出，该报以独立的批评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逻辑与道德的理论和话语实践形式，构建起丰富多样的批评类型与广大开阔、生机勃勃的批评空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媒介批评观念，紧密呼应、

关怀、规范和引导着新闻传播实践，为促进中国现代新闻业的专业化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作为抗日战争以前“北京报界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报纸”^[2]，《晨报》及其副刊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在传统的中国新闻史叙述中更受重视，尤其是对《晨报附镌》在五四前后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劳绩，学术界研究和讨论较多，而对其在媒介批评领域的努力和耕耘则缺少应有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在梳理五四时期《晨报》媒介批评实践主题和内容的基础上，对其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形式和特色略作归纳，以期

对该报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作出更为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一、对新闻传播业务问题的批评

社会新闻一般是指以生活、风貌、问题、事件为题材，与广大群众的生活、利益、情趣相关的报道，尤以社会道德伦理为基础反映社会风尚的新闻为主。新闻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因此自新闻产生以来，社会新闻就已存在，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新闻，却自近代新闻业诞生后才蔚为大观，成为重要的新闻品类。近代中国报纸上的社会新闻，为了迎合部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往往追求曲折、离奇和制造噱头的表现手法，内容以色情、抢劫、凶杀之类的黄色新闻为主，不仅无法净化社会风气，而且腐蚀了社会道德，引起了很多正直之士的反感和不满。对社会新闻进行批评，是北京《晨报》媒介批评的重要内容。1921年12月1日，《晨报》刊发《国民公报》主编孙几伊《对于〈晨报〉底一些贡献》一文。作为新闻业的同道，孙氏此文虽借着纪念《晨报》创刊三周年的由头，但通篇所言不是《晨报》的优点，而是该报的缺点，尤其是通过分析《晨报》有关社会新闻的问题，进而达到对社会新闻的整体性批判，具有强烈的媒介批评意义。孙几伊指出：“《晨报》对于社会，总算是个公正的制裁者或灵敏的引导者，但有时她底纪载或议论，也有失检之处，失了她制裁或引导的意义。”^[3]作者首先列举该报关于曹汝霖任江苏水灾筹赈会理事新闻报道中的“失检”之处，然后将笔墨引申到“北京报纸近来有一种注重社会新闻底倾向”，指出这本来是报纸新闻报道进步的表现，且此倾向的产生，《晨报》也有提倡之功，随后批评道：“以现在看去，各报底社会新闻多不能算是新闻，一种是剿袭旧说部里底奇闻异事，一种是社会问题底讨论。”^[4]孙几伊分析，前者之所以产生，“大概由于新闻记者，迎合社会的好奇心，只要是奇闻，便不问是否事实，都采用了，访员又迎合新闻记者底这种心理，遂闭门造出这一类的新闻来。”^[5]所以此报登了，彼报又登，人名地名虽不

同，但情节完全雷同，甚而至于在一张报纸上面，前后再见，令人哑然失笑。后者则有一大半为假造而来。“我亲见一个社会新闻的访员，他告诉我北京许多社会情形，很有系统，似乎句句都是实话，我偶然碰着机会，想证实他的话，去探索一问，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6]这一类新闻，《晨报》上尤其多，大概是因《晨报》记者有些注重社会问题的倾向，于是这些访员便迎合着胡诌起来。孙几伊指出这种现象的一种危害是：“反过来说，既有这一类假造的社会新闻，真实的社会新闻倒不容易见到了。便有真实的社会新闻，也语焉不详。”^[7]即报纸因此而失去了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

人们对外地、特别是外国信息的需求，是促使近代报刊问世的原因之一。因此，近代报刊诞生之始，就具有开放的性质，而非一地一国所能局面。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人类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世界政治和经济日趋交融，各国的新闻事业也愈来愈具有国际化的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中国的卷入，使众多的国人渐趋关注世界大势，对国际新闻的需要日益迫切。但是，近代新闻事业产生的晚近，以及长期闭关锁国所形成的内向性思维，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报纸上国际新闻量少质劣。对国际新闻报道的这种状况，《晨报》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抱怨。1922年5月28日，《晨报》发表了署名“春江”的《报纸可不载国际新闻么》质问道：“不高兴登载外国新闻，现在几乎成了北京报界的一种风气，有的将从前外国新闻所占的篇幅减少了。有的将外国新闻移在不紧要的地位。有的简直一条不载。现在世界固然没有什么大事，可供大登特登的，然而总有可以登载的事实，乃竟都看做不必要，这实在不行。”^[8]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闭关的时代，一般人可不与闻世界之事，只晓得国内之事，乃至只爱听政界之事。久而久之，其固陋的程度，势必与日俱增，危险实不堪言。作者认为在世界一体时代，国际新闻报道应该“以读者应知与否为衡”^[9]。他甚至提出国际新闻至少也可以占得全报之半，再严格采择，也该有十分之四或者十分之三。但现在各报竟至

连十分之一也没有，这怎么能行呢！

失实是中外新闻传播中的痼疾，也是最为人们尤其是读者诟病的顽症。《晨报》对新闻失实问题多次给予各种形式、角度的分析和批评，以引起新闻工作者的警惕和改正。在众多的批评文本中，以刘家铤的《新闻为编辑弄不确实的原因》一文最为全面系统。刘家铤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21年12月1日《晨报》创刊三周年纪念号上。刘家铤在文中认为，新闻报道的真实与否，不单是编辑的责任，因为编辑只是新闻传播流程中的一个环节。编辑虽然有时也参与新闻的采集，但更多的时候，他是根据他人采集来的资料进行加工。如果送来的新闻资料有不实之处，编辑很难加以避免。但是，作为新闻传播的把关人，编辑不能因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因为无论是哪一方面采集来的新闻，都只是供给编辑加工的素材，至于是否发表以及如何发表，则完全是编辑的自由和权力，“所以由社会上一般看报的人看来，这种责任仍然要编辑完全负担。”^[10]刘家铤随后重点分析了假定采集来的材料本身确实，因编辑加工而致不确实的情况。他认为这一类新闻不确实原因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意的不确实。这一类又包括被动和自动两种。前者是因为受到某种势力的压迫，不得不将新闻搁置，甚而只好昧着良心造谣；后者则既可能是考虑在发表后会产生不良社会效果的善意之举，也可能是以造谣为手段，企图获得某种个人经济利益。第二类为无意的不确实。这种不确实因是编辑的无意之举，所以更难以避免。它或是因编辑在选择材料来源和根据时产生误判，或是在他整理材料时产生失误，或是在进行文字加工时用词不当，这都可能导致新闻的不确实。刘家铤在文章的最后，还顺便对当时北京的报纸，常在新闻中“加上若干议论”^[11]，以使新闻报道拉大篇幅，以显示自己的报道很特别的做法提出异议。他批评这种办法，往往会把新闻的真相埋没了；因为所谓议论，只是编辑者的个人见解，其见解是否正确，尚未可知，现在你把它硬加进去，看的人容易为他所限。看报的人，一般不会去仔细地推敲思考，“所以最容易把这种议论和事实看作一片，不去自己斟酌，无意

中便把事实的真相弄错了。”^[12]他认为采取这种编辑方法，诚然不能就说他有什么故意的作用，但是这种办法实在是很是不妥，所以他希望编辑们要特别加以避免。

夹叙夹议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很流行的写作方法，其特点是一面叙述某一件事，一面又对该事进行分析和评论，在叙述过程中插入议论，以表明对人物或事件的认识、态度和评价等。这种写作方法的好处是笔法既灵活多变、生动活泼，还可以通过议论性文字起到总起、提示、过渡或者总结等作用。正是由于这种方法能够具体地记叙事件，充分地抒发感情，而且能直接揭示所写对象的意义，因而历来为中国文人所熟知和重视。而新闻报道则是西方新闻业的产物，在近代新闻业传播到中国的时候，西方新闻业已经发展到了大众传播时代，在新闻写作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的把事实和议论分开的报道模式。这种新闻写作模式经过民国以后一批有留学经历、受过西方新闻业熏染和影响的知识人的介绍，逐渐传播到国内，并被一些具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视为新闻写作模式的正道，从而获得了某些专业话语的正当性，成为一种媒介批评的标准。对新闻报道中事实与议论不分的写作模式进行抨击，揭露其危害所在，这种批评不仅在前述刘家铤的文章中清晰可见，而且是五四时期北京《晨报》开展媒介批评时一个非常自觉的专业努力方向。

1922年6月4日，林仲易在《我们刊行“新闻纸问题”号的意思》一文中，向读者明确宣布，基于新闻纸的使命、目的、如何才能办好新闻纸这些基本的常识问题，将对新闻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抨击，提出“编新闻都应该用客观的来记载，不应夹杂编辑者许多的意见于其间，编辑者对于某问题如有意见，就应该在社论栏里来发表”^[13]的观点。他指出：“近来北京城报纸，有一种最流用的编辑法，就是议论和事实混合的政治新闻，吾人若分解其成分，则议论（严格说：还不配叫做议论，只是胡说罢了）常占十分之六七，而事实只有二三，此种编法，叫作论评，又明明是记载新闻，叫作新闻，又明明杂有许多编辑者的意见，简单评他一句，是不成东西。然而这不

成东西的新闻纸，还有许多人爱看，并且还有人叫好，这岂不是怪事么？其实也不怪，就是一般人不明新闻纸是什么，该怎么的原故啊！”^[14]其对新闻问题的抨击和分析，颇具行内人的专业眼光和胆量，诚可谓切中肯綮。

二、对新闻记者道德失范问题的批评

每一种行业在其职业活动中都有应该遵循的体现该职业特征、调整其职业关系的职业行为准则和规范。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新闻传播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定内容的职业道德规范。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并不是抽象之物，而是表现在具体的新闻传播活动之中。媒体的社会责任是指新闻从业人员在传播活动中必须履行的对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和公众心智健康与公序良俗所承担的法律、道德等公共责任与社会义务。新闻道德水准的高低、优劣，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对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新闻媒体既是社会的公器，又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诉求，这种集多种属性于一身的现实，使其常要面对和处理不同的价值冲突，要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和媒体经济利益的双重诉求。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的北京，乃至全国新闻界，新闻职业道德状况都不容乐观，不仅有偿新闻、虚假新闻大量出现，而且新闻从业人员借新闻报道行敲诈勒索之事也时有发生，对社会良善风气的养成造成了极大危害，令社会各界啧有烦言。抨击新闻道德失范现象，是《晨报》五四时期媒介批评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体现出该报对新闻伦理建设的关切和维护。

早在《晨钟报》时期，该报就专门刊登了《山东报界之恶现象》的新闻报道，对山东报界一些报纸以敲竹杠来维持生存的丑行进行了揭露。报道说山东报界本极幼稚，从前只有《简报》《山东日报》《大东日报》三种，无甚出色之处，不过日剪津沪报纸上的新闻附以本省琐闻而已。“近来甫经出版之报，有一二种资本本极薄弱，遂不得不专以敲竹杠为政策，如财政厅盐运司各富足机关亦渐以利啖之，以关其口。”有些人见竹杠容易

敲，便动了歪心思。“几思假报以染指，又无资本开幕，遂仅只赁房数间，贴黄布条二幅，称某报筹备处，以待竹杠敲成然后出版。”不过，竹杠亦不易敲，其中大有名堂。“已出版之报，因财政厅盐运司皆有津贴，省长孙公系总督乡人，根基素劲，知其决不作买收报纸举动，乃集矢于法院警厅济南道三机关不息，此三机关素以瘠著，经费自顾不暇，安有余款以应若辈取求。”因此，在屡扣罔应之下，又不能找到三个机关长官的劣迹，于是乎，“日惟提关于个人私德，涉及闺闼之种种秽言，肆口辱骂，即旧有之山东各报，亦多讥其无赖。”^[15]该新闻认为，长此下去必将触犯刑律，不免有法庭相见之日。

刘家铤在《新闻为编辑弄不确实的原因》中对拿新闻作交换以谋取私利的道德腐败行为也予以痛斥：“当编辑的人，道德不高尚，常常藉此作某种不道德的行为，这是现在世界上常有的事情，在我们中华民国的新闻界里更多。因为他要这样，所以在作的时候，不能不拿造谣来作武器；在目的已达的时候，又不能不拿造谣来作报酬；所以他的新闻便差不多没有确实的时候。”^[16]刘家铤还提醒人们说：你如果要想认清这种不道德的编辑，也很容易，只要留心他那主张的常常变更就行了。确乎如此，新闻领域中的故意性失实，常常出自那些在立场上朝三暮四、毫无操守之辈。

政治上的收买与新闻记者敲竹杠等腐败行为互为因果。《晨报》在《收买报纸是一件最笨的事》一文中从最终收买无法彻底奏效的角度，正告那些达官贵人们：“近来新闻记者敲竹杠底风日盛一日，而一般达官贵人们也似以应酬竹杠，为当做应该而且必要的事；殊不知你们这钱实在花得又笨又可怜。试问你们天天作恶，卖官鬻缺，岂是化几文钱，在新闻记者方面敷衍一下，就可掩尽天下耳目吗？如果这样，那真只有你们底世界了，那一般无钱的小百姓就永无翻身之日了。”^[17]作者“闷闷”为此举例道：安福系极盛时，自己直接办报和间接受买报馆有好几十家，结果不过在他们全部罪恶之中，再加上一笔收买舆论的罪。其实舆论何曾被他收买？最可怜的是他们花钱找人办报，一家又一家，自以为会有自己的

许多报纸在社会上飞舞，一定可以摇惑许多不知他们罪恶的人；殊不知他们的报除了自己看，社会上的人就是想看也不见。原来领他们钱办报的先生，并不把报纸当做对社会说话的工具，只当做是向东家支钱的报销册。闷闷就亲眼见到当时有一家报馆每天只印三十份，他们研究最为经济的办法，是几家报馆公排一块版面，只有报头上的木戳是各家特制；结果总归是各拿数十份报给东家和东家有关系的人看。所以说，这种东家不是一种绝对的冤大头吗？该作者进行媒介批评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认为收买报纸与记者敲竹杠互为因果。“没有以敲竹杠为衣食的新闻记者，达官贵人就要收买报纸也没有这个市。”^[18]反过来也可以说，“没人要收买报纸，自然没有秽恶的报纸以及下三烂的新闻记者，所以我为廓清报界的电气计，很希望达官贵人有些觉悟。我并不是希望他们觉悟了不作恶，我希望他觉悟收买报纸底钱花得冤。”^[19]他希望他们将造孽钱花到别的地方，何必来做这种害人又害己，搅乱和败坏新闻道德之事呢？作者闷闷的希望虽有些不切实际，但批评的大方向和出发点则有道理。

闷闷在《北京新闻纸底趣谈》一文中，对作为首善之区北京新闻界的藏污纳垢，给予了全面的揭露。他说，就北京报纸和通讯社而论，共有一百家之多，但其中有许多不但你要买也买不着，且连名字也不知道。随后他列举了一些自己经历的北京新闻纸“趣谈”：如在某通讯社编辑室的墙上粘着份名单，上面写了些当代名人的名字，这些名人名字头上，有的打了红圈，有的没有。我们走进去看，便觉得莫名其妙。后来仔细一打听，才知原委。这般滑头记者平素有个秘诀，就是没有新闻时，就摸着头，想想“今天骂谁呢？”于是他的新闻就从这个“骂谁”的话里来。当没有新闻时，编辑就看看那个名单，查查谁的名字上头没有划红圈。因为照他的编辑定例，凡属骂过的都画上红圈，以免在极短时间内，骂重复了，产生前后矛盾。但有一次编辑不小心，误将奔走大江南北、热心国是会议的某要人骂了，却忘掉了加上红圈，恰巧第二日，又糊里糊涂重骂一顿。该报前一天说，“本社接得南京电，某公于今午在

督军署，与齐督面谈，如何如何。”但是第二天又说，“某公于今早进府，面谒徐总统如何如何。”在读者看来，某通信社消息虽然灵通，只是此奔走大江南北的要人，却未免太神速了，头天下午既然还在南京，却又怎地下午在北京见徐世昌呢？于是大众莫不笑其造谣言过于笨拙。其所以弄出这种笑话来，完全是由于头日编辑时，没有划红圈所致！^[20]

对新闻记者缺乏常识却不懂装懂、企图愚弄读者恶行的批评。孙伏园曾在《晨报》上发表的题为《特志之以供科学界之研究》一文对此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孙伏园在文中说，上海的报纸上常常有一种志异式新闻，其内容为雄鸡生蛋、母猪三足、人头豕身、人身豕头等。这些新闻末尾照例有一句：“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21]孙伏园指出：“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真要请科学家去研究，不过是志异式新闻的一种结尾语，仿佛是‘须至志异式新闻者！’”。^[22]何以见得呢？因为在远没有科学家的古代，这种志异式的文字也早已有了，内容完全与现在的志异式新闻一样，只是结尾没有一句“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现在既有了科学家，作者明知这些怪事与科学相冲突，不过是特此反照一笔罢了。在中国近代初有报纸时，人们都还没有养成看报纸的习惯，加以那时《申报》的言论不过是劝人戒吸鸦片等等，谁喜欢听这种干燥无味的话？于是志异式的新闻便应运而生了。孙伏园认为，的确有许多人，因为要看雄鸡生蛋的缘故，无意中看到了世界大势，因而逐渐超脱雄鸡生蛋这一层次，变成报纸的正式读者了。而在报纸的编辑者这方面，既用雄鸡生蛋将读者引诱上了正轨，同时也应该将这下陋的药饵式的工具抛弃到九霄云外去。“但是，我看现在能够抛弃这下陋工具的报纸，实在是很少很少。他们并且变本加厉，造成了一个一定不移的结尾语，就是‘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23]因此，孙伏园一针见血地说：报纸上常有的“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这一句话，如果不当他是一种刻板的结尾之语，只能说明新闻记者是在有意地愚弄读者、挑战公众常识罢了，也是一种传播态度不诚实、新闻道德不良的表现。

三、五四时期《晨报》 媒介批评的话语特色

媒介批评的基础是对新闻媒体及其行为的反省，而对新闻媒体及其行为的反省，又根植于批评主体对新闻媒体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and 定义。北京《晨报》的前身是1916年8月15日问世的《晨钟报》，李大钊被聘为该报的编辑主任。在《晨钟报》创刊号上，李大钊不仅为该报撰写了题为《〈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再造》的代发刊词，号召青年冲破旧势力的束缚，站在民主自由的最前列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而且确立了请读者监督报纸以开展媒介批评的精神。该报刊登的《本报编辑部启事一》云：“本报创刊伊始，力求精审，自愧菲材，深虑弗逮。海内贤达，如不见弃，幸赐纠绳，无任铭感。”^[24]因此，积极开展媒介批评，就成为《晨钟报》及后来《晨报》的一贯追求。具体言之，该报的媒介批评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话语特色。

1. 自觉的主体意识

顾名思义，媒介批评是对媒介的得失、利弊、优劣的指陈，批评的对象是媒介本身，因此，媒介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媒介批评能开展起来并持续下去，需要媒介本身的积极配合、支持和参与。可以说，社会媒介批评整体上开展得如何，与社会文化氛围、风气与政治机制有关，更与媒介主体意识的自觉性有关。而媒介主体意识的有无、高低则取决于新闻从业人员对媒体社会功能和责任的体认，取决于他们对媒介批评功能的充分认同，表现于他们对媒介批评采取的立场、态度和倾向。《晨报》媒介批评主体意识自觉性不仅体现在该报经常地大量刊登读者对媒介的批评性来信、来论，而且通过开设媒介批评专栏，主动组织报纸从业人员、读者以及有关人员，对新闻领域的各种问题进行批评。最能显示该报媒介批评自觉主体意识的是，1922年6月4日，该报专门设立了一个名为“新闻纸问题号”专栏。该报编辑在《我们刊行“新闻纸问题号”的意思》中交代其发刊意图，因为近年来北京

报纸日渐退步，“我们为供给大家这种缺乏的需求，特地来刊行‘新闻纸问题号’，读者若肯破费时间来一读，总可以增进些常识。以后我们还想以较好的材料，供给大众，这不过我们第一次小小的贡献啊！”^[25]其所体现的媒介批评意识，在当时的中国报界确无出其右者。

2. 强烈的现实关怀

现实关怀是一个媒介批评者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更是媒介批评的生命和价值之源。《晨报》媒介批评所指涉的对象，都是当时新闻传播中所普遍存在着的突出问题，如国际新闻的匮乏、社会新闻内容的庸俗低下、新闻写作中叙议不分、新闻工作者借新闻采访和报道之名敲竹杠，等等，无一不是当时客观的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批评，对其现象加以归纳，对其社会根源进行分析，都是《晨报》媒介批评的施力之处和重要内容。这些新闻传播中的问题和偏向，一般读者也会有所注意，但由于不掌握专业话语知识，他们的有关分析和指陈往往不能深入事物的内部，不仅理论说服力不够，而且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传播。《晨报》所刊登的媒介批评文本，很多都出自该社或其他媒体编辑、记者之手，他们对问题的分析，由于身处其中，所以往往能够切中肯綮，鞭辟入里。即便这些批评文本的作者不是媒介中人，他们绝大多数也都是平常具有阅读报纸习惯、关注报纸的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报纸的功能一般都具有一定的了解，对报纸问题的批评和分析，也都具有相应的现实来源，是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媒介批评天然地会成为折射时代意识的棱镜。正是有了《晨报》的这些媒介批评文本，为我们认识和理解20世纪20年代中国多样性的新闻生态，提供了另一幅生动而细腻的参照图景。

3. 浓郁的批判色彩

批判性是媒介批评的本质特征，是媒介批评最为典型而突出的话语实践特征。媒介批评的批判性表现在对现存媒介及其关系的审视、否定、超越，媒介批评的这种否定表面上以观念和现象的批判为前导，实质上是以媒介的健康发展与完善，以及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为根本旨归，体现了

一种创新的新闻实践与理想追求。《晨报》媒介批评的这种浓郁批判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某种新闻实践及现象的大力否定，无论是新闻记者敲竹杠，还是社会新闻报道内容庸俗低劣，抑或是新闻写作中“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这种为愚弄读者而故作惊人之语的写作套路，都是新闻传播中的不正常现象，都构成了新闻传播发展道路上的逆流和反动，都需要予以抵制和清除。《晨报》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对人们从理论上认识这些问题的危害，从而澄清是非，树立起正确的新闻观念，无疑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二是从建设性的角度提出某些新闻改进建议和努力的方向，如张维周的《编辑新闻的我见》，从自身“一年来编辑新闻的一点经验”出发，提出在处理新闻时应注意“考究其是否确实，较量其是否紧要”^[26]这两个方面，不仅在选择新闻时要注意，在处理新闻时也要注意。其立论既有编辑经验基础，又有新闻价值理论色彩，具有很强的建设性。这是针对当时一些消息报道缺乏新闻价值的反思，从另一方面体现出了其话语的批判性。

4. 开阔的世界视野

在世界一体化的观念和语境中，媒介已被置于更为广阔开放的批评视野，不再是一块封闭的领地。在《晨报》的媒介批评话语中，它常常是站在世界新闻传播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新闻传播，这一方面表现在它非常关注中国新闻事业在国外新闻人士眼中的印象，并有意识地通过发表域外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评价，从而达到会聚中外新闻观念于一体，开阔国人新闻视野的作用。1922年6月4日，该报《新闻纸问题号》上发表了明宵翻译的《中国之新闻事业》一文，这是当时《北京英文导报》的社论。该篇文章与其他文章共同组成了该报的《新闻纸问题号》。这种刻意的稿件组织配合，不仅起到了丰富该媒介批评专号内容和稿件来源的效果，而且也使其批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1921年11月15日，《晨报副镌》第1—3版刊登了本月10日到北京访问的伦敦《泰晤士报》社长北岩勋爵的长篇传略，题为《介绍世界最著名之新闻家诺士克立夫》，是该报当时驻英特派员陈贤溥的专稿。该报在发表这篇专稿

的时候，编辑又以“记者”的名义发表了题为《介绍诺斯克立夫的意趣》的杂感，再次批评中国新闻事业太幼稚、新闻记者太没有知识、中国一般人太看轻新闻事业。尤其是杂感文末作者交代写作缘由：“我们欢迎诺斯克立夫，因为他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药。”^[27]可谓一语道出了其媒介批评视野阔大的内在原因。

5. 平等的对话空间

媒介批评正常有序开展，需要有一个相对自由、平等的话语交流平台。《晨报》在组织和开展媒介批评时，充分地表现出了其积极营造自由发表批评意见空间的努力倾向，尽可能地通过《晨报》这块阵地，组织和发表不同声音、不同来源的媒介批评性稿件。该报发表的不仅有报社以及同业的媒介批评文章，还有大量来自读者的批评和建议性稿件，特别是同业及读者对《晨报》的批评文章，也都一视同仁，给予见刊的机会。1922年6月4日，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了《政论家与政党》一文，文末“附论”对北京报纸在时事报道方面的“麻木与混沌”提出批评：“即如董康在这个时候敢出来做财政上的清理与改革，这种‘掇木梢’的精神，不能不使我们佩服，舆论对他，至少应该表示一种同情的援助。然而北京的报界对他只有嘲笑与讥讽，甚至于那主张新文化的《晨报》也只有嘲笑与讥讽。董康的同情者倒是那远在三万里外的伦敦《泰晤士报》与《孟彻司脱高丁报》！这是我们不能满意的。”^[28]对此，《晨报》在6月5日《编辑余谈》栏目中发表了《答胡适君》一文，通过事实对胡适的批评提出反驳。胡适见到该报反驳后，遂致信《晨报》对其反驳再提出辩驳。《晨报》接信后，迅即于6月7日以《胡适君致本报函》原文刊出。对胡适的批评以及其后反驳的处理，不因自己的媒介地位而垄断言论空间，体现出了该报对媒介批评及其言论自由的深刻理解和积极营造。

6. 多样的文体形式

媒介批评要对某种不正确新闻观念或现象进行否定，因此，要达到这种目的，媒介批评以议论文体较为普遍。但是，作为独立的文本体裁，文体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是一种历史内容

和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它反映了文本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性特点，属于形式范畴。每一种文体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采用什么样的文体形式，要根据实际的媒介批评需要，根据批评对象和批评目的，进行相应的选择调整和控制，以便取得预期或者最佳的媒介批评效果。媒介批评没有统一的文体形式要求，但从追求批评效果最大化的角度看，媒介批评的文体不应千篇一律，而应多种多样。从文体形式上看，《晨报》的媒介批评可谓多姿多彩。既有形式严整的评论，又有灵活的杂感；既有庄重的社论，又有随意的编辑余谈、专栏按语和编辑提示；既有出自编辑、记者之手的行家深度解析，又有来自读者的印象扫描与读后感；特别是除了一般的议论文体外，还有如《山东报界之恶现象》那样的新闻报道通讯。值得注意的是，该报还刊登了中国现代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先生的《新闻记者》^[29]和焦菊隐的《逃婚者》^[30]两个独幕剧本。两者都通过文学手法，对新闻记者敲诈勒索与丧失职业品格的行径予以了愤怒揭露和无情痛斥，既有力地拓展了《晨报》媒介批评的文体形式，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奉献了两个颇为经典的新闻记者败类形象。

五四运动同时也是中国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争奇斗艳，呈现出一派动人的繁荣景象。在这种社会氛围熏染和时代思潮的裹挟下，以及新闻事业发展的推动下，五四时期的媒介批评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当时中国的新闻机构大部分掌握在军阀、官僚和资产阶级手中，不仅报纸消息来源单

一，而且充斥着各种虚假的消息，谣言惑众，新闻界更是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不满和厌恶。在五四运动时期，《晨报》（包括《晨报副镌》）上曾发表了许多讨论新闻使命、新闻理想、新闻功能和社会责任的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揭露和抨击了当时新闻界的各种脱序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新闻理论的建构，推动了新闻传播实践，提升了新闻职业伦理水平，净化了新闻生态环境。1932年4月，曾经的《晨报》总编辑林仲易就此回忆道：“记得八九年前我在《晨报》时候，和同事张琴南——现任天津《庸报》总编辑，刘新锐二君，每周办个《新闻专号》，专攻击各报编辑的不对，如前几年大家记载政治新闻，总是夹叙夹议，一条消息参杂许多编者意见在内，后经我们极力攻击，谓记载新闻应持客观的态度。大家见说，也感着以前不对，渐渐改过来了。”^[31]五四时期媒介批评的发展及其表现，是五四新闻事业发展的生动反映，虽然其中夹杂着各种难以言传的政治、社会、文化、道德功利，但确实体现了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觉，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时代气息和专业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北京《晨报》的媒介批评并不是该报的个体性行为，而具有类型学上的整体性意义，它是五四时期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彰显自身本质存在与发展内在逻辑的理论话语反映，其中体现出来的开展媒介批评的主动精神和专业态度，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责任编辑：强若琳）

参考文献：

- [1] 张慧玲、任东晖：《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诞生期》，《湖南大众传媒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82—83页。
- [2] 李雷波：《抗战前北京“晨报”编辑出版系统演变考实》，《民国研究》，2014年春季号（总第25辑），第213—228页。
- [3] [4] [5] [6] [7] 孙几伊：《对于晨报底一些贡献》，《晨报》，1921年12月1日，第3版。
- [8] [9] 春江：《报纸可不载国际新闻么》，《晨报》，1922年5月28日，第7版。
- [10] [11] [12] [16] 刘家锦：《新闻为编辑弄不确实的原因》，《晨报》，1921年12月1日，第3版。
- [13] [14] [25] 天云：《我们刊行“新闻纸问题”号的意思》，《晨报》，1922年6月4日，第6版。
- [15] 蜚公（特约山东通讯员）：《山东报界之恶现象》，《晨钟报》，1916年8月31日，第3版。
- [17] [18] [19] 闷闷：《收买报纸是一件最笨的事》，《晨报》，1922年5月21日，第7版。

- [20] 闷闷:《北京新闻纸底趣谈》,《晨报》,1922年6月4日,第7版.
- [21] [22][23] 伏庐:《特志之以供科学家之研究》,《晨报》,1922年8月6日,第7版.
- [24] 《本报编辑部启事一》,《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第2版.
- [26] 维周:《编辑新闻的我见》,《晨报》,1922年6月4日,第7版.
- [27] 记者:《介绍诺斯克立夫的意趣》,《晨报》,1921年11月15日,第3版.
- [28] 胡适:《政论家与政党》,《努力》,1922年6月4日,第1版.
- [29] 熊佛西:《新闻记者(独幕剧)》,《晨报副镌》,1922年4月19日至1922年4月23日,第3版.
- [30] 焦菊隐:《逃婚者》,《晨报副镌·文学旬刊》,1924年6月1日,第2版.
- [31] 林仲易:《谈谈几个报业改良的实际问题——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新闻讨论周讲演》,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新闻学研究》,北京:颀华印书局,1932年,第2页.

On the Media Criticism Practice and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of *Morning Post in Beijing*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Hu Zhengqiang, Li Siqi

[Abstract]Attaching importance to media criticism is a very prominent form of news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discourse practice of *Morning Post in Beijing*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The newspaper once sharply criticized the prevailing problems in the Chinese press at that time, such as the vulgar social news, the lack of international news, the inaccurate news report, the way of writing news with mixed facts and opinions and so on. It also penetratingly disclosed and analyzed the manifestations and causes of many undesirable phenomena, for example, social forces bought the news media, journalists sought personal gains through news reports, and journalists lacked scientific knowledge but pretended to understand they didn't know. All these showed that the newspaper hoped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society and the reflection of the media. Conscious subject consciousness, strong realistic concern, strong critical color, broad world vision, equal dialogue space and diverse forms of criticism are the main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 criticism practice of *Morning Post in Beijing*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The media criticism of *Morning Post*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has a holistic significance, which is a theoretical discourse reflection that revealed the intrinsic existence and developed the internal logic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The May Fourth Period; *Morning Post in Beijing*; Media criticism